

●
●
赫鲁晓夫的悲剧



赫鲁晓夫的悲剧

[苏]阿列克赛·阿朱别依 著

陈明至 译

民族出版社

本书根据苏联《旗帜》杂志 1988年第6、7期
《那十年——记赫鲁晓夫时代》俄文本译出

[苏] 阿列克赛·阿朱别依 著
陈明至 译

赫鲁晓夫的悲剧

责任编辑 王一之 周凤荣

装帧设计 刘家峰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印张：6 字数：147(千)

1989年2月第1版

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50,000册

ISBN7 105-00842-3/I·173

(汉28) 定价：2.45元



1962年。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。

① 赫鲁晓夫
在观礼台上



② 赫鲁晓夫全家。左起第一人：本文作者阿·阿朱别依。左起第四人：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·彼得罗夫娜。右起第二人：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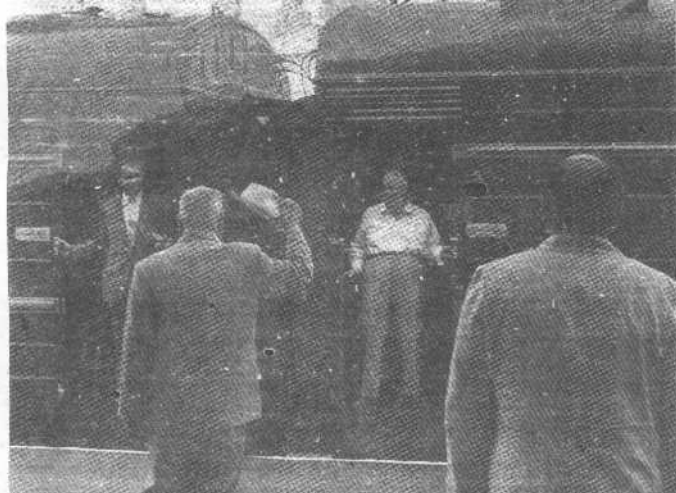


演 讲



乘雪橇

退休生活



出行



1964年4月，赫鲁晓夫七十岁寿辰。



赫鲁晓夫和群众在一起。

1966年的元旦，我和我的妻子是在朋友萨仁家度过的。他家的窗户朝着伏龙芝滨河街。隔窗望去，白雪覆盖的河面尽收眼底。高尔基文化公园里结了冰的道路上，不时闪过滑冰运动员的身影。成串成串的五彩灯泡活象童话中的“魔鬼的车轮”，发出环形的光亮。这色彩和光亮拥抱着黑黝黝的涅斯库什花园。无论是光亮的还是黑暗的，这交织出来的欢乐气氛，此时，完全适合我们等待新年钟声的心情。

暗灰色的列车沿着环形桥的钢轨隆隆驶过。我总是非常同情节日里还要上班的人们。其实，这对于在报社工作的人来说，简直是家常便饭。我在元旦得闲，是因为可巧《消息报》的同事把这天的版样拿给另一位责任编辑去签发。

天快亮时，几位迟到的客人来访——一位著名演员和他的妻子，还有一位军衔不低的军人。女士们好奇地数他肩章上的星，在丈夫们的帮助下才知道，他是上将。

“我们同上将虽说才认识，可是钟声已经敲过，该是去年的事了——那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新年招待会上。”著名演员说。接着，他道出将军的名字和父称，看样子是以此结束他对将军的介绍。

应当为这位被人拉来做“通宵散步”的将军说句公道话，到陌生人家做客，并不让他发窘。在新年的日子里，大家总是显得既善良又聪明。彼此似乎全都成了朋友。

是的，这家的男主人很快就赢得了客人们的喜爱——他身材高大魁梧，声音浑厚，富于感情。他用那种好听的男低音巧妙地引导着餐桌上的气氛，为已经昏昏欲睡的客人们提精神。他是一位老练的看火人。时时留神着，不让煤火熄灭……

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在生活中转瞬即逝，有多少情感融汇在这种意味深长的谈话中，除了交流一些极不现实的愿望而外，这些长

谈往往毫无意义。可我们还是说啊，聊啊，就象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，明知道口若悬河与尼亚加拉瀑布完全是两码事，可还是不能自制。

说真的，若不是那位上将，1966年的这次“新年夜话”，早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。当时，我没注意到，究竟是什么时候，将军和主人都提高了嗓门儿。从只言片语中可以听出，他们在谈论赫鲁晓夫被免职，激烈地谈论这个事件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

“我告诉你，这是苏联历史上堕落的、该诅咒的十年！”将军几乎是在吼叫。

“你最好还是尽快忘掉这段时光吧，否则，你将来会请求原谅的。而且人们还会不相信你。”

主人反驳将军。将军气得使劲扣上制服的钮扣，并且按住演员的肩膀——

“走！咱们几个好象没有地方可去了，在这儿寻快活……”

演员抖动了一下，纤细的双手捂住了眼睛。但我还是发现，他脸上的肌肉绷紧了。我了解他，这是个一点就着的直性子。我们在艺术剧院的进修班一起学习过。看得出来，他现在已经火了，一旦爆发，恐怕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。

然而使我惊奇的是，此时，他站起身来，非常平心静气地、彬彬有礼地说：

“将军，我和您的分歧正在这里，我认为这十年是伟大的十年。每个人都有权保持自己观点，遗憾的是不知为什么，您却不允许我们的主人拥有他自己的观点。”

1954年至1964年——我们在生活中几乎不能提及的这十年究竟是怎样的年代。是劳动与创造的十年，还是充满矛盾困扰，命运难卜的十年？究竟为什么有人一定要拼命把这十年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？似乎这十年背后隐藏着什么罪过？许许多多的名字和业绩，数字和对比，都从书本和影片中被删掉，被涂改。

然而，生活绝不会依一两个人（无论他多么万能）的意志为转移，

事情远非如此简单。

对尼基塔·谢尔盖耶维奇·赫鲁晓夫的缄默是恶意的。

天真的人们会认为，这是对赫鲁晓夫在党和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的否定。然而，最为重要的不在此。那个曾经被赫鲁晓夫撼动了的官僚机构对他采取“不饶恕”的态度——那种不可一世的“力量展示”在警告人们“不许碰我！”

对于已经过去的那些不平静又不十分寻常的年代，任何一种最完备的计算机都不可能得出统一的结论。同样十分荒谬的是，有人指望只要把画笔蘸黑或蘸红，就能够把历史重新描绘。——不仅那十年，还有苏联历史上的整整七十年！

一切具有健全思维的人都要求将历史还给人民。对于这种自然而然的愿望必须做出答复。事情必将如此发展。它依赖于许许多多的人——历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政治学家、社会学家等所有见证人和当事人的努力。可以期望，自觉意识将会在客观分析“赫鲁晓夫十年”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。

忘记过去是危险的。

我们必须而且能够尽快地摧毁那些束缚我们的东西。

为此，没有高昂的热情，没有牺牲，没有痛苦是不行的。欢乐总是与忧愁为伴。

就象党的“二十大”以后的那些年的情景一样，我们这一代人生命中的许多东西都与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关，而且大多数人至今不改初衷。他们中就有娜捷拉·格奥尔基耶芙娜、洛尔德基帕尼泽和维克多·瓦西利耶维奇·萨仁夫妇。我知道，奥列格·尼古拉耶维奇、叶夫列莫夫仍缅怀青年时代的日子。他就是那天晚上兴高采烈地把将军拖到萨仁家里的那位演员。

我的朋友还住在伏龙芝滨河街。他们的女儿娜塔莎长大了，出嫁了。我的三个儿子也已长成了大小伙子。可对于那个新年之夜的争论，孩子们都一无所知。现在他们常常问起：那十年，我们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？

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们这期间的一切。

回顾这段往事，我并不责备自己没有做详尽的日记，许多事件是我亲身经历的。那十年，我先后在《共青团真理报》和《消息报》工作，写在这里的，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笔记，而并非一部有着种种诱人内幕的回忆录。

不可否认，我的日记不仅写下我的观点，还反映出我的兴趣。如果以为我能避免主观的评价，那将是天真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将尽力以事实为依据。

“真实，应该渗透每个报人的毛孔，就象矿工浑身上下布满了煤屑。”——鲍里斯·尼古拉耶维奇·彼列伏依曾这样教诲《共青团真理报》的年轻记者、编辑。他说：“在最初选举最高苏维埃的年代，我接受过一个任务，去采访一位列宁格勒的工人，他是代表候选人。我赶到彼得堡，跟他长时间交谈，还认识了他的家人。当《共青团真理报》登出我的采访报道后，我给他寄去一份我签名的报纸。后来，我接到他的回信——

‘您写的都是事实，记者同志。可您为什么要写我在镜子前梳头？难道您忘记了我是个十足的秃子？’天哪——鲍里斯·尼古拉耶维奇感慨地叫道——“千万别再发生这种哭笑不得的事。”

此外，我认为遵守另一条原则也是重要的：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评判过去的事情。不能把发生在彼时彼地的事当成发生在此时此地去对待。不要忘记，没有什么比实用主义带来的惋惜、叹息更无用。当我们中间的好多人感到了“二十大”的冲击波正在减弱，而裹足不前势必导致倒退时，其原因是可以想见的。我们是否要自责，为什么不能竭力坚持“二十大”的事业？或者应该坦率地承认，我们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真正的观点。这是一种习惯，一种对于调和矛盾，过太平日子的习惯。或者，反过来，把一切都记在党的第一书记尼·谢·赫鲁晓夫的账上。这是最简便的方案之一，在某种意义上讲，这很方便。这样一来，每个人都应该意味深长地耸耸肩。

我对儿子们说：“是的，我们有过错，这是因为我们曾经被相互

隔绝。还因为，存在于我们身上的知识分子特有的自我约束。”

我们决不会这样做的。现在，当“公开性”这个字眼的内涵及其责任大大丰富，同时被到处使用之时，常常是那些在任何朝代都不曾有过什么损失的人来宣布真理。

我常用这句话提醒孩子：“不要责备那些没有来得及或是没有做成什么事的人；不要打扰那些正在做事的人；要紧的是加紧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。”

1987年春天，与政治隔绝了二十年之后，我被邀请参加《消息报》创办七十周年纪念日活动，而且有关方面还把我列入大会主席团成员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个纪念日差不多成了我的节日。那天晚上，我重新见到了往日的同事。在那份发行量很大的《消息报人》小报上，刊登了往日《消息报》老同仁们所写的短文，当然，也有我写的，我愿把它抄录在这里——

读者明天才能知道的事，报人今天就会知道。他们的生活就是由经常不断的超前信息组成。因此，他们的生命也就总在他们的期待中度过并消耗得更快。在《消息报》的纪念日子里，我想起另一些人，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们，只是作为记忆留在我们的良知与事业中。我想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，但却突然哽住——这是一个长长的、沉重的名单。

我在报社时没有与亚历山大·鲍维内伊共过事，但我深深理解他的思想：非他即我，舍此没有第三种选择。那些想在后备队里避风的人享受不到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幸福。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“初试身手”并非总是失败的。将近三十年前，《消息报人》就做过这种尝试，也许某些因素曾使我们离开了原有的立场，但我们已经懂得，只要站在党性原则的立场上，站在民主和公开性的立场

上，只要不把“尽职”与“服务”这样的概念混淆，我们的报纸，我们职业就有力量。

真妒嫉今天在《消息报》工作的人们！他们有冲锋陷阵的经验，有时间对懒惰、对拖沓作风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！

政治与社会生活方面的后退有时是从细微的、不起眼的地方开始的。稍后，当一切都不可更改时，你才会明白，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退潮，对此，一个人的生命在上帝恩准的期限内恐怕无能为力。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例证。

“二十大”把名誉、尊严还给了数以千万计无辜的、斯大林专横制度的牺牲者。这应当看作是一个历史纪念碑，无论对死者还是对活着的人。

在那次纪念晚会上，我熟悉的一位文学家这样对我说：“咱们总归还算幸运，‘二十大’以后，一切一切才真正开始。希望我们能在‘二十七次’以后做成几件事。”

我们俩人都很清楚，一切都不会如此简单。现在就有人抱怨：真遗憾，“赫鲁晓夫时代”还不让位。这些人幻想通过“铁腕”、“强权”来达到他们的目的。试图从这种幻想中找到躲避一切灾祸的灵丹妙药。托洛茨基分子也曾经断言：没有什么能比民主政治更反动。

大概，那位将军未假思索就说出来的也是类似的意思。

在《消息报人》上撰文的还有梅罗尔·斯图鲁阿。他是一大批积极活跃、才华横溢的新闻工作者中的一员。1959年，我们俩——主编和责任编辑——常常跑到印刷厂和拼版车间，不客气地更换已经打出来的题目。这是些令人生厌的标题。那时，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和可能，去摆脱沉闷、单调、刻板的框框，以唤起读者的兴趣。

一天，梅罗尔照编辑部的指示去叶利谢耶夫商店买来四公斤黑

鱼子酱。当夜把这东西带到了舍列梅耶沃机场，托英国不列颠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捎往伦敦。在这之前，我曾在电话中约查理·卓别林把他《自传》里的部分章节提供给我们的创刊号。卓别林答应了，并指定用这种黑鱼子酱作为稿酬。

之后，卓别林高兴地告诉我们，鱼子酱来得正是时候，那是在他为《自传》出版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上。

《自传》片断在《消息报》发表的同时，我们还穿插发表了这份材料约到的经过。这在读者中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，我们自然为此而高兴。这一被人称作“把笔插入西方报纸”的举动，应该“归功于《泰晤士报》的主编，他曾经亲自来《消息报》，不无自信地企图教会我们应变能力和灵活性。

当这位不可一世的主编大人看到《消息报》发表了卓别林的《自传》片断时，他打电话到我们编辑部来，请求派他的一名同仁来莫斯科见习。

顺便一提，用鱼子酱付稿酬这件事，很让我们报社的会计高兴了一阵子。

插入这样一段是为了让人们明白：为什么我要援引麦洛尔·格奥尔舍耶维奇在《消息报人》上的话——

记得有一次编辑部通宵没有休息。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事，主编在工作短会上向大家谈起他的担忧。

“二十大”以后，报纸向前迈了一大步——主编说，时代在前进，我们的思想却停滞不前，原地踏步。让我们准备一下，明天这一期出版后，讨论下一步怎么走。全体出席，时间不限。如果有必要，可以讨论到天亮。索尼亚会用夹肉面包支持这一举动。

.....

我们开始高谈阔论，探讨怎样走这第二步。女速记员都来不及记录我们在谈话中提出的新构想，那么多栏题以及如何对稿件加工

……时间在热烈的讨论中一秒一秒过去。不觉窗外已是黎明。然而，我们为一种隐秘的忧愁困扰，我们感觉到，一夜所谈，似乎与“第二步”毫无共同之处。除去言辞上的装饰，就思想实质而论，依然在原地踏步。

忧思变得沉闷，甚至有些焦虑。我忍不住挑起了话头。

——阿列克塞·伊万诺维奇——我说，如果我们的党不打算迈出这一步，我们的报纸就不可能迈出第二步。没日没夜地空谈，毫无意义。

一片死寂。人们的目光都盯着总编辑……

1964年10月的日子里我们的家庭发生急剧的变化。我安慰妻子拉达忘记那些委屈和不公证。在最艰难的时刻，拉达认定，社会必将重新找到它失去的动力，从个人的不幸中，她看到了社会的希望和未来。

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。历史嘲笑了那个无知的裁决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讲述我和我的亲友们知道的、经历过的一切。

1949年即将结束了。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大学生们熬过了例行的考期，再过两个月就要到报社实习了。我和拉达在莫斯科她父亲赫鲁晓夫家里复习功课。那时赫鲁晓夫还在乌克兰工作。

赫鲁晓夫的家在格拉诺夫斯基路，莫斯科的老住户都知道这所住宅。因为这里是苏维埃五号院。从前是舍列梅契耶夫公爵家族的宅第，它由建筑师亚力山大·梅斯涅尔按照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崇尚的风格建造而成，门前有一个小花园。革命前，这里曾住过一位富豪。革命胜利后的十年间，这里曾由军队和党的活动家们居住。1938年，尼·谢·赫鲁晓夫在这里分到一套住宅。尼·谢·赫鲁晓夫当年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，同时被派驻乌克兰，任党的第一书记。赫鲁晓夫无论从基辅来，从前线来，都住在这里。房间是半空的，没有地毯，没有装饰橱，没有水晶玻璃吊灯，没有油

画、版画。一个花岗石台座的台灯，毛玻璃灯罩，仿铜镶边，样子象个大蘑菇。

这里的家俱笨重，色调沉闷，每个房间的陈设大体一样。那个年代，无论是高级官员，还是普通人，都不讲究家庭摆设。

后来我明白了那个年代审美趣味的由来。斯大林本人就生活在那种由“公家”严格规定的制度之中。他的家，他的别墅，他办公的地方，一个样子的木制墙壁，天花板、地板。仿佛是由同一个工厂生产出来的。

住宅的主人，包括赫鲁晓夫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认为那种通常概念中的家庭用具是属于自己的。他们居住的地方的任何东西，实际上都不属于他们。台布、毛巾上都印着蓝颜色的“苏维埃五号院”或其他机关的标记和字样，桌椅、沙发上都钉着打有机关财产号的金属牌。住室里偶尔会闯入几位声色俱厉的妇女，手里拿着“登记簿”。那是来核对财产号的。那严厉的态度和眼神，就象这里的东西已被什么人偷走了似的。

赫鲁晓夫的居室更是空空荡荡。事实上，他的一大家子人多住在基辅，赫鲁晓夫本人也偶尔才来莫斯科，对家里的陈设，每个家庭成员都漠不关心。

那天已经很晚了，我和拉达刚读完了复习提纲，前厅里顿时响起了脚步声，有人正穿过过厅走进房间来。原来是赫鲁晓夫回来了。一起进来的还有万达·利沃芙娜·瓦西列夫斯卡娅和亚历山大·叶夫多基莫维奇·考涅楚克。拉达跑到厨房里帮保姆弄吃的。不一会儿，大家就围坐在餐桌旁。按规矩，我们是不可以打搅长辈们的谈话的。不过，听了一会儿也就知道了。原来赫鲁晓夫刚从斯大林那儿来。在回家的途中，他把来莫斯科办私事的瓦西列夫斯卡娅和考涅楚克叫来了。

看得出来，此刻，赫鲁晓夫显得很激动，谈话伙伴是他特意找来的。他说，他得马上回基辅交待工作，因为他已被选为莫斯科州党委会的书记。

万达·利沃芙娜哭起来：“乌克兰非常需要您，尼基塔·谢尔盖耶维奇”

这番话震动了赫鲁晓夫。他知道，万达·利沃芙娜是真心说这番话的。万达·利沃芙娜是波兰和苏联作家，著名国际主义战士。战争年代，她活跃在报纸上、杂志上。在前线和赫鲁晓夫相遇，1942年出版的瓦西列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《虹》被誉为是一本战斗的书，荣获斯大林奖金。

瓦西列夫斯卡娅和考涅楚克两人特别珍视与赫鲁晓夫的友谊。亚历山大·叶夫多基莫维奇——著名的剧作家，是《舰队的毁灭》、《普拉东·克列切特》、《前线》等剧作的作者，一位热情、积极的社会活动家。尼基塔·谢尔盖耶维奇曾经坚决地维护过考涅楚克——歌剧《波格丹·赫梅利尼茨基》（达尼凯维奇著）的词作者。1951年夏天举行的乌克兰文学艺术旬就是以这部歌剧的上演开始的。当时，《真理报》发表了批评这部歌剧的文章，指责它有“民族主义”错误。罪名显然是严重的。赫鲁晓夫后来讲，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斯大林的火压下去。最后决定让作者做必要的修改，否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时，被列入批判名单的作品和作者，均受到了党中央的严厉制裁。

万达·利沃芙娜·瓦西列夫斯卡娅于1964年7月去世，她没有得到赫鲁晓夫被免职的消息。不知亚历山大·考涅楚克对此有什么想法。

尼基塔·谢尔盖耶维奇去世后，尼娜·彼得罗夫娜没有从考涅楚克那儿得到任何表示，哪怕是短短几个字的吊唁。

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，但如此的人很多。

斯大林把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的决定是突然做出的，这后面隐藏着什么，直到现在谁也不知道。就象谁也不知道他俩私下到底说了些什么。

看起来这一“干部换位”似乎是即兴之举，实际上却包含着对下一步棋的考虑。